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23.04.001

衡量中国式现代化历史效应的三维坐标

张明,方宇迪

(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南京210046)

摘要:中国式现代化生发于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奋斗进程之中,党的领导与社会主义构成了衡量中国式现代化本质的双位视角,塑造了中国式现代化基于本土实际的中国特色。中国式现代化并非在西方现代化的传统叙事框架中展开的探索,而是具有深层次的逻辑超越性,这从根本上决定了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意义需要突破民族性实践的单一维度,上升到世界历史的普遍性高度加以认知。从基础理论维度而言,中国式现代化基于中国本土经验,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化理论;从现实实践层面而言,中国式现代化以其现实的经验性事实超越了西方现代化的先验性逻辑,为后发民族国家独立自主探索现代化道路提供了中国经验;从更高层次的文明维度而言,中国式现代化使现代化实践与新文明再造发生本质性关联,开创了人类文明形态的全新叙事方式。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社会主义;人类文明新形态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23)04-0001-07

现代化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历史叙事的核心主题,推动中国社会从传统到现代转型升级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根本任务。“实现现代化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矢志奋斗的梦想。中国共产党100多年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追求民族复兴的历史,也是一部不断探索现代化道路的历史。”^①经过长期不懈努力,中国共产党承继了近代以来求索现代化的历史任务,通过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不同时期的接续探索,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并非在西方现代化的传统叙事框架内的模式复制或理论平移,而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深刻扎根中国具体实际与历史文化传统基础上进行的全新探索。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现代性批判的价值立场与理论观点,内嵌于中国共产党关于现代化的理论思考与实践探索之中,这使得中国式现代化从根本上具备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深层次逻辑超越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意义,不能单纯局限于中国本土的经验视角,而需要突破民族性实践的单一维度,上升到世界历史的普遍

性高度加以综合把握。本文拟从基础理论维度、现实实践维度、文明维度三个方面切入,期冀综合锚定中国式现代化世界历史意义的理论坐标。

一 基础理论维度:以本土经验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

关于资本现代性的批判,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理论主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以资本逻辑为核心的西方现代化作出了系统病理解剖,并在此基础上对人类社会未来走向特别是一种新现代性的建构进行了丰富的理论探索。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具有内在鲜明的复调式结构:一方面,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合理性表达了充分肯定,诸如肯定资本主义在解放社会生产力、推动人与人之间交往的普遍化以及推动世界市场和所谓世界历史的生成等方面都具有不容抹煞的巨大历史进步性;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又立足于劳动和资本的深刻矛盾,对资本现代性进行深入批判,并预设了资本主义必然走向灭亡的最终归宿。肯定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合理性意义与批判资本现代性内

收稿日期:2023-03-10

基金项目:国家级重大人才工程项目“中国道路的若干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研究”

作者简介:张明(1987—),男,江苏南京人,博士,副教授,博士生导师,江苏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①习近平:《携手同行现代化之路——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5页。

在弊病的双重向度,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的基本特征。

以工业革命为先导的资本主义现代化,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特别是传统社会生产秩序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①一方面,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交通工具的突飞猛进,使社会生产关系与交往关系产生了剧烈的历史性变动,原先民族性、区域性的生产活动成为世界历史性的生产活动,原先基于宗法血缘等自然意义上的有限交往开始走向世界范围内的普遍交往。服务于资本增殖最大化目的的资本主义生产,在其产生之初就与殖民主义保持着紧密的联系,二者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世界化扩张,使得商品市场与消费也日益世界化,“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②。随着资本主义现代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升,历史也逐步转变为“世界历史”,这一过程的实现并不是所谓绝对精神的抽象思辨,而是通过经验事实可以观察到的现实过程。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带来的巨大生产力与剧烈的社会变革,使得保守封闭的传统理念与传统经济逐渐消解,各民族之间产生了以往不曾有过的依赖关系,并且这种依赖关系表现为“中心与边缘”的差序性格局。马克思曾明确指出:“它(资产阶级——引者注)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③实际上,上述话语深刻指涉了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内在弊病,即基于资本抽象统治基础上的价值增殖及其构建的世界市场和世界历史更多地是以差序性方式而存在,资本主义现代化与殖民主义现代性之间保持着同频张力关系,其无法掩饰资本来到人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④的根本事实。这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外在批判,这种外在维度的批判始终是与马克思对资本现代性内在维度的批判紧密关

联的。从资本现代性的内在弊病而言,马克思深刻洞察了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弊病,即资本使得抽象成为统治一切的力量。马克思深刻指出了资本逻辑的形而上学特征。由资本现代性构筑的外在世界,其本质上不过是一个着了魔的、颠倒的、倒立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资本先生和土地太太,作为社会的人物,同时又直接作为单纯的物,在兴妖作怪。”^⑤马克思正是通过对资本现代性的形而上学抽象性进行深入剖析,才完成了对以资本逻辑为核心的西式现代化内核的深刻批判。

中国式现代化产生发展于中国百年现代化求索的历史进程之中,带有鲜明的中国本土性色彩。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社会主义价值属性,构建了审视中国式现代化的双位视角,本土文明与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百余现代化实践历史中相互交融,超越了以资本为运行逻辑的西方现代化范式,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

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拓宽了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的理论视野。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主要以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理论分析对象,主要内容是关于建构一种超越西欧现代化的新型现代化道路,本质是现代西方文明废墟基础上的更高层次探索。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中提出的10条建议,实际上存在着如下基本前提,即“最先进的国家几乎都可以采取下面的措施”^⑥。这集中凸显了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视野的集中性与聚焦性,即围绕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向更高层次现代文明转向的社会主义可能性,其对于后发民族国家如何实现现代化鲜有涉及。唯一比较突出的是关于跳出“卡夫丁峡谷”问题的相关阐释。对于这一问题的谈论集中于马克思《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以下简称《复信》)相关材料。在《复信四稿(复信正文——引者注)》中,马克思指出:“这一运动的‘历史必然性’明确地限制在西欧各国的范围内。”^⑦《宣言》1882年俄文版序言明确指出:“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

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4—35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5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5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29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46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21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839页。

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①这里强调的是俄国革命与西方革命的双向关系,俄国公社能否跳出“卡夫丁峡谷”,关键要看能否跳出西欧资本主义历史中农民与土地分离的苦难而实现更高层次的共产主义经济体制。上述思考仅仅是理论上的设想,马克思主义经典现代化理论并未见证后发民族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具体实践,其理论也就无法形成对后发国家现代化的系统研究与经验提炼,因而在理论触角上不可避免地缺少对后发国家现代化的关照。反之,中国式现代化是后发民族国家独立自主探求现代化的创新性实践,其并非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现代化为主要参照系,而是始终直面中国自身现代化问题的特殊实践。中国式现代化所凸显的后发民族国家本土性立场与民族性现代化实践运动,拓宽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的视域,将后发民族国家的现代化经验引入马克思主义经典现代化理论的丰富与发展之中。

另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以地方性经验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的价值关怀。经典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脱胎于资本主义时代生产方式内在矛盾冲突的背景下,社会主义现代化方案是作为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对偶性”而存在的。也就是说,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的逻辑建构中,社会主义现代化方案是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更优方案,其本质是超越资本主义现代化和形而上学文明观的一种新型现代化方案与新文明理念。相反,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生成有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的内在历史特殊性。1840年鸦片战争是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分水岭,也是中国现代化意识生成的历史和逻辑起点,标志着中国数千年社会历史发展的“异轨”,即由原先独立封闭的封建王朝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蒋廷黻曾在《中国近代史》中提出:“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能废除我们的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能的话,我们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话,我们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②中国现代化探索的历史出场与西方现代化的根本不同之处在于,中国现代化的历程始终与民族前途紧密关联,始终关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

国式现代化不仅需要完成人类现代化的一般任务——推动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而且需要承担其产生之初就面临的求索民族复兴的历史重任。中国式现代化不仅在其历史“出场”之时就肩负着解决民族生存危机的历史重任,同时也承载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想的实践指向。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愿景置放于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之上加以推进,体现了民族复兴历史叙事与现代化历史叙事的有机融合。中国式现代化从中国本土立场出发,将民族复兴的叙事融入人类现代化进程的逻辑转向,这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所不具备的特殊价值关照。这种民族生存危机基础之上的现代化探索,实际上预设了一种内在超越殖民主义现代化的全新可能性,即在本土经验基础上实现对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中社会主义现代化方案非资本主义历史超越性的有机补充,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对于后发民族国家现代化实践的本土性价值关怀。

二 现实实践维度:为后发民族国家实现现代化提供中国经验

衡量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历史意义,离不开后发民族国家现代化实践的参照系。因为从最直接层面而言,中国式现代化实践本身是后发民族国家走向现代化实践的重要“样板”。特别是在当前广大后发民族国家走向现代化实践中面临“既希望加快发展”与“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矛盾的特殊时代背景下,基于本土性实践形成的“中国经验”究竟能为后发民族国家现代化实践提供何种有益参考,这是亟须回答的重要理论和现实问题。在阐释这一问题的过程中,可能在现实层面会面临一定的挑战,即在总结现代化的“中国经验”时如何规避“自说自话”的被动局面。应对这一挑战关键在于厘清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科学阐释后发民族国家现代化实践缘何会走向不可调和的内在矛盾境地;二是系统回答中国式现代化究竟能为广大后发民族国家现代化实践提供何种超越特殊而上升到一般的普遍性经验与智慧。

(一)“中心—边缘”:差序性世界格局与后发民族国家现代化困境

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整体进程来看,加快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79页。

^②蒋廷黻:《中国近代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3页。

发展与保持自身独立性本身并不构成必然矛盾。资本主义在推动自身现代化进程中,既实现了发展的加速,同时也保持了自身的独立性。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一矛盾是在广大后发民族国家追求现代化进程中产生的,其本质原因在于非西方国家的本土性现代化实践,在由资本现代性构筑的差序性世界体系下,必然面临主体性失落与独立性丧失的历史困境。从时间上来看,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率先开启了人类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西式现代化作为一种先行的现代化实践,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学家的操作下被抽空了具体的历史性内涵,被人为打扮成一种先验的绝对神性存在。广大后发民族国家的所谓传统性、落后性与经历过现代化的西方国家的现代性与发达性形成了鲜明对比,似乎人类走向现代化的道路只存在西方模式这一唯一可能性,“现代化=西方化”也顺理成章成为人类走向现代化进程中的意识形态幻象。

资本现代性的所谓绝对排他的价值理念,伴随着资本的全球性扩张而展开了世界性外溢的过程。因为资本现代性所构建的世界市场与世界历史,从其本质上而言不过是服务于资本增殖的根本目的。资本现代性的价值理念推动了西式文明重塑世界历史的进程,即人类历史特别是文明史的发展被规制为一个从低级到高级、从传统到现代的普世现代化转型,而推动这一切的最终力量不过是资本所谓的“普照光”。由此可见,资本主义现代化将其作为经验性的存在打扮成先验性、超验性存在,抹杀了一切民族国家现代化实践的具体性、历史性差异,消解了现代化多元叙事的可能性。正如国外学者指出:“在这类现代性话语中,只存在一个故事,它是‘先进’国家/民族/文化领头的故事。只存在一种历史。空间性的现实重要性,多元叙述的可能性,都丧失了。”^①因此,在“中心—边缘”的差序性现代化格局之下,广大后发民族国家在探索现代化的过程中,始终面临“加快发展”与“保持自主”之间的深刻矛盾,其只能以简单依附西方现代化体系的方式推动自身现代化建设,只能局限于以西方现代化为实现现代化的唯一路径、以西式现代化标准为衡量自身现代化实践的唯一参考。

(二) 多元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对后发民族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意义

实践已经充分证明,实现现代化并不是西方少数国家的专利,拙劣模仿他国现代化模式不可能到达现代化的光明彼岸。文明传统、现实境遇的不同从根本上决定了各民族国家在探索现代化道路上的不同选择。坚持独立自主的同时保持开放的心态,走一条具有本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这是中国式现代化对拓展后发民族国家现代化实践的重要意义所在。

第一,坚定作为复数的现代化及其历史必然的信念。中国式现代化并非复制粘贴西式现代化理论的照搬照抄,而是基于自身实际国情进行的自主探索,中国式现代化有其自身的特殊版权。这种独立自主的现代化实践对于广大后发民族国家现代化探索的最大参考意义在于,其从现实经验层面证明任何民族、任何国家都有资格与权利去探索一条符合自身国情的现代化道路,西方国家并没有也不可能垄断现代化的话语权和阐释权。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实践,以无可辩驳的方式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打破了后发民族国家必须依附西式现代化模式才能实现现代化的意识形态藩篱。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一个和平发展的世界应该承载不同形态的文明,必须兼容走向现代化的多样道路。”^②各民族国家历史传统、经济结构、现实条件的差异,必然会催生关于现代化道路的不同选择。不同的现代化道路选择并不存在所谓高低优劣之分,而是基于自身实际的必然选择。中国式现代化从本质上来说,就是中国共产党关于“走自己的路”的价值理念在现代化道路选择上的具体彰显,其在现实实践层面上所取得的显著成就,为后发国家独立自主探索现代化道路提供了强大信心。因为中国式现代化从根本上证明了人类现代化并不是一种单数的存在,而是始终作为一种复数形式存在着,不同民族国家关于现代化的不同方案,共同丰富了人类走向现代化的多元图景。

第二,从本国历史文化传统出发选择现代化道路。中国共产党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践过程中,始终面临着如何处理“传统”与“现代”关系的问题。实际上,传统与现代二者本身并非截然对

^①多琳·马西:《保卫空间》,王爱松译,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2017年版,第97页。

^②习近平:《坚定信心 共克时艰 共建更加美好的世界——在第七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5页。

峙的关系,而是处在相互交融、有机统一的辩证关系之中。任何一个民族、国家的现代化实践,都不可能脱离其特殊的历史和传统文化而孤立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深刻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个结合”,特别是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入结合,构成了中国共产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遵循的基本理论原则。可以说,中华民族的文明基因推进了中国独具特色的现代化进程,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与历史悠久的价值底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今世界不同国家、不同地区各具特色的现代化道路,植根于丰富多样、源远流长的文明传承。人类社会创造的各种文明,都闪烁着璀璨光芒,为各国现代化积蓄了厚重底蕴、赋予了鲜明特质,并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共同为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作出了重要贡献。”^①上述重要论断实际上厘清了长期以来困扰广大后发民族国家现代化实践的关键问题,即在推进现代化进程中传统文明的处境地位问题。在西方现代化的话语霸权之下,广大后发民族国家被赋予所谓传统与落后的外衣,本民族历史文化传统被人为贬低为阻碍现代化实践的落后因子。因此,在殖民主义现代化体系及其话语霸权之下,后发民族国家实现现代化必须从根基上解构传统,全盘接受西式现代化的所谓普遍性真理。然而,中国共产党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并没有从根基上否认自身的历史和传统文化,而是将历史文化传统视为推动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精神资源。诸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独有的世界观、宇宙观、人生观、道德观、生态观,在推进现代化的实践中非但没有退场,反而经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重要文化根基。因此,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推进,为后发民族国家坚定从自身历史文化传统出发,走出一条独具自身特色的现代化道路提供了多样化参考。

第三,以开放姿态充分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积极成果。强调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立自主性,并非意味着其是封闭孤立的实践。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式现代化探索的整体历史进程中,始终坚守胸怀天下的理念,坚持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指导,将中国式现代化探索置于世界历史发展的整体谱系之中加以综合定位。新民主主义革

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和根本社会条件。中国共产党明确将新民主主义革命与世界革命相关联,将廓清中国式现代化政治前提的革命实践纳入全球革命的视野加以综合把握。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式现代化探索由原先的理论设想转变为现实层面的实践活动。尽管受“冷战”环境影响,当时中国式现代化探索主要是在与资本主义现代化截然对立的氛围下展开的,但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关注世界现代化运动发展的潮流,着力探索在资本主义封闭体系之中可以开辟的空间,例如在超越意识形态界分基础上提出的“三个世界”理论。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科学把握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明确将中国式现代化探索与全球现代化潮流紧密关联,充分借鉴吸收西方现代化的一切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统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充分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先进成果发展中国式现代化。

三 人类文明维度:开创了人类文明形态的全新叙事逻辑

探讨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历史意义不能拘泥于现代化的单一理论视野,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性“出场”始终与一种新文明的再造紧密关联。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展现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图景,是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②中国式现代化的最终价值导向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建构,这种新文明的建构既是本民族传统文明在现代化场域中的转型升级,也是吸收世界文明一切先进成果的交融性产物。中国式现代化所开创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人类文明发展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开创了人类文明的全新叙事逻辑,彰显了 21 世纪人类文明发展的新走向。

第一,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充分包容而非单一排他的文明样态。纵观人类文明发展史,人类文明总是呈现曲折性与前进性的统一,人类文明从

^①习近平:《携手同行现代化之路——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人民出版社 2023 年版,第 7 页。

^②《习近平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正确理解和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人民日报》2023 年 2 月 8 日。

来没有固定在某一特定文明类型停滞不前。但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不断推进,资本主义使抽象成为统治,直接导致资本主义文明被人为抽空了具象性内涵,似乎成为一种永恒神圣的存在。20世纪后半叶以来,尤其是苏东剧变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维护资本主义文明的“一元主导性”,在意识形态层面提出了如“历史终结论”与“文明冲突论”等论调。实际上,人类文明发展绝不可能走向所谓的“终结”,将现代西方国家的自由民主制度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模式视为人类文明的终极形态,不过是基于“西方文明中心”立场的意识形态幻象。文明冲突理论则将现实世界冲突的动因归结为“文化认同”问题,实际上阉割了资本主义差序性世界体系中的全球性剥削,用抽象文化问题取代了政治经济层面的现实问题。中国共产党通过中国式现代化开创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建立在深刻透析人类文明演进规律、切实关照人类文明走向基础之上的必然产物,而不是所谓“一元文明”模式的再造。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认为,“文明只有姹紫嫣红之别,但绝无高低优劣之分”^①。在实践与理论的维度,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了人类文明评价范式与发展规律的全新叙事逻辑。衡量文明发展不是绝对神性观念的抽象思辨,在现实层面也不可能存在所谓绝对抽象的文明样态。人类文明的发展始终与现实物质性生产活动紧密关联,现代文明的建构从根本上难以脱离现代化的现实进程。中国式现代化将新文明的建构坐落于现代化的实践基础之上,通过超越以资本逻辑为核心的新型现代化探索,进而创造一种超越西式抽象文明观的文明新样态。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深入推进,证明了新文明的再造归根结底在于现实的现代化实践,所谓普适性、排他性文明样态于理论或实践都不过是一种主观想象。

第二,人类文明新形态是立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文明样态。在由资本建构的西式现代化逻辑之中,人是以资本的外化表现形式存在的。原先作为推动历史发展主体的现实个人,被资本逻辑抽空了历史性内涵,沦为一种异己性、客体性

存在。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价值导向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能够超越西式现代化“只见物不见人”的逻辑误区,使人能够从资本市场的物质逻辑中逃离,使发达的生产力不再是限制人自身解放与发展的枷锁,人实现了真正的自由全面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坚守人民至上理念,突出现代化方向的人民性。”^②中国共产党使命型政党的身份属性,从根本上折射出人民性的价值内涵。因而,在中国共产党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整体过程中,人始终是现代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最终价值追求。进一步讲,中国式现代化在价值向度上呈现显著的双重向度,即个人与“共同体”、物质与精神的有机统一。资本主义现代社会中由于对抗性分工所催生的特殊利益与普遍利益冲突,个人与“共同体”必然呈现撕裂与对抗的紧张关系,即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言的“随着分工的发展也产生了单个人的利益或单个家庭的利益与所有互相交往的个人的共同利益之间的矛盾”^③。针对这一问题,中国式现代化所给出的价值选择是“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共同富裕并非某种脱离实际的纯粹理想,而是深刻根植于现实个人自由全面发展诉求基础上的价值追求。

第三,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人与自然矛盾真正求解的文明样态。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人类解放,必须以“人类与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④为前提。西式现代化以实现资本最大化增殖为最终目的,特别是随着工业革命的深入发展,技术和理性不断呈现其内在的强大“魔力”,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近代以来最为深刻的彻底性变革——自然由原先作为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母体”,沦为可供恣意攫取的受动性存在,人类中心主义与工业中心主义的倾向不断增强。正如国外学者所言:“资本主义的积累和危机会导致生态问题,而生态问题(包括环境及社会运动对这种问题所做出的反应)反过来又会导致经济问题。”^⑤如何超越西式现代化造成

①习近平:《深化文明交流互鉴 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6页。

②习近平:《携手同行现代化之路——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2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6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3页。

⑤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唐正东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65页。

的人与自然界关系“异化”的理论误区,这是中国式现代化需要回答的重大时代之问。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其通过建构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实践,创造了一种超越西方工业中心主义的生态文明观。中国式现代化之所以能够开创新型生态文明观,是由传统和现实等多重因素综合决定的。从历史文化的传统角度而言,人与自然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始终关切的重要问题。中华文明中“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理念,直接催生了中国人正确处理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先在文化心理结构。特别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万物一体”的理念,成为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内在理论支援。正如有学者所言:“‘万物一体’的思想是宇宙关联性最高的伦理体现,它既指示出个人对关联整体的义务,也指示出追求整体的和谐是人的根本目标。”^①从实践的角度而言,人类自工业革命以来在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的深刻教训,为作为后发现代化实践的

中国式现代化留下了深刻反思的空间。“人类进入工业文明时代以来……打破了地球生态系统原有的循环和平衡,造成人与自然关系紧张。从上世纪 30 年代开始,一些西方国家相继发生多起环境公害事件,损失巨大,震惊世界,引发了人们对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深刻反思。”^②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一种后发型现代化,可以充分吸取西式现代化在其发展过程中造成的人与自然关系矛盾突出的深刻教训,从现实层面提供一种内在超越的可能性。

概而言之,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百年探索的核心议题,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叙事的基础逻辑。衡量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意义需要实现双重维度的超越,即超越本土维度而上升到世界历史维度、超越现代化逻辑而上升到文明逻辑。中国式现代化以其显著成就深刻凸显了人类现代化的多元化图景,构建了一种超越资本主义形而上学抽象文明观的全新文明形态。

Three-dimensional Coordinates for Measuring the Historical Effects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ZHANG Ming & FANG Yu-di

(School of Marxism Studies,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46, China)

Abstract: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is born out of the century-long historical struggl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e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and socialism constitute a dual perspective for measuring the essence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shaping the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on the basis of local reality. This fundamentally determines that to grasp the value and significance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it is necessary to break through the single dimension of national practice and to recognize it at the universal level of world history. In terms of basic theory,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has enriched and developed the Marxist theory of modernization based on China's local experience; in terms of actual practic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has transcended the a priori logic of western modernization with its empirical facts and provided Chinese experience for late-developing nation-states to explore the modernization path independently; in terms of higher civilizational dimension,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makes the practice of modernization essentially related to the re-creation of new civilization, and creates a new narrative of human civilization.

Key words: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socialism; new model for human advancement

(责任校对 唐尧)

^①陈来:《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国学流变与传统价值观》,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5 年版,第 32—33 页。

^②《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3 卷)》,外文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360 页。